

名家MING JIA FENG FAN
风范

将金融理论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

——记金融学家周骏

□宋清华

今年 83 岁高龄的周骏教授从事金融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已整整 60 年，其教学研究生涯可用“厚重”一词来概括。他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科的奠基人之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国家重点学科的主要创建者，是我国老一辈金融学家的重要代表。2010 年，周骏教授入选首届“荆楚社科名家”，是湖北省委、省政府表彰的首批 13 名“荆楚社科名家”中唯一的一名金融学家。

我与周骏教授结识近 30 年。1981 年，我进入湖北财经学院（中南财经政法大的前身）学习金融专业，本科阶段有幸聆听周骏教授的教诲。1985 年，我考上本校货币银行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周骏教授给我们开设了几门课程。1997 年，我在周骏教授的指导下开始在职攻读博士学位，他指导我完成了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银行危机论》。2003 年，为了庆祝周骏教授从教 50 周年，我协助他编辑出版了《周骏选集》。之后，我还和周骏教授等人一起主编了《中国金融风险的管理与控制》、《商业银行创新与资本市场》等著作，并参与了他和王学青教授主编的《货币银行学》（第三版）的编写工作。

有思想的金融学家

周骏教授很好地将马克思主义货币金融理论、西方货币金融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他自己完整的货币金融理论体系。他在货币流通理论、马克思主义货币金融理论、货币政策与金融调控、金融风险管理、资本市场等领域均作出过重要的原创性贡献，提出了诸多新颖的观点，如社会主义制度下货币仍是商品的一般等价形式，社会主义国家应根据货币流通规律的要求计划调节货币流通，存款是货币量的一种存在形式，金融宏观调控在从直接调控过渡到间接调控的过程中须经过混合调控阶段等。

周骏教授的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货币金融领域。经过长期思考，他撰写了《正确看待社会主义》、《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坚持发展劳动价值观》、《我国为什么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经济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等文章，这些文章均被收录到《周骏选集》一书中。他还注意学习和研究儒家经典著作，如《四书》、《左传》等，形成了他对



■周骏

儒家思想的系统看法，并以此教育学生。

周骏教授非常重视教材建设。他撰写和主编出版了 7 部教材，这些教材在金融人才培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81 年，他与人合编的《社会主义货币信用学》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他独自撰写的教材《社会主义货币银行学》、《社会主义金融学》、《马克思的货币金融理论与四化建设》分别于 1983 年、1987 年、1989 年由中国经济金融出版社出版。其中，《社会主义货币银行学》于 1988 年获财政部优秀教材二等奖，《社会主义金融学》于同年获全国高等院校金融类优秀教材二等奖，《马克思的货币金融理论与四化建设》先后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奖二等奖、第二届普通高等院校优秀教材奖、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金融类优秀教材一等奖。他与王学青教授主编的《货币银行学原理》，1996 年由中国经济金融出版社出版，2011 年第三版时更名为《货币银行学》。该教材曾是国家教委推荐教材，后成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重视实践是金融教研之本”

周骏教授认为，培养自然科学家要进实验室，培养社会科学家要进入社会，不了解社会的人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社会科学家。在其代表作《货币政策与金融调控》一书的前言中，他说：“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力求运用各种有益的理论，紧密联系我国实际，并尽量运用实证的方法，对我国货币政策与金融调控问题，提出一些个

人的意见和建议。”我觉得可将他倡导并践行的研究方法概括为“一论两实”，即理论、实际与实证。不仅金融理论研究要联系实际，金融教学也要联系实际。周骏教授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金融教学研究应该始终与实践活动相结合，与经济社会生活共脉搏。重视实践是金融教研之本。”

周骏教授不畏模型，喜用数据说话。1993 年，周骏教授出版《货币政策与金融调控》一书，较多地“运用实证的方法”。该书第三章研究了我国货币需要量的计量模型，分析了影响我国货币需求的因素；第四章研究了我国货币供应模型，分析了个人行为、企业行为、国家行为如何影响货币供应等问题。该书有编号的模型或公式就有 39 个，还有许多模型或公式没有编号。周骏教授不仅能将将这些模型的经济含义说得很清楚，还能交待清楚其来龙去脉，这在老一辈金融学家中是难能可贵的。2011 年 6 月，周骏教授在首届中国金融学科技身成就颁奖典礼暨中国金融学科发展论坛上发表演讲时提出，根据我国 30 多年的发展经验，最好的政策组合是 16% 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9% 的经济增长率和 1% 的通货膨胀率，他希望中青年学者对这一实践经验加以研究。

周骏教授曾长期担任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货币政策与金融宏观调控研究会主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武汉市人民政府咨询委员、湖北省金融学会副会长等社会职务，在 60 年的学术生涯中，他积极建言献策，提供咨询，服务社会、学

用结合，为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以及重大金融决策提供了建设性意见。货币流通是周骏教授学术研究的起点。早在 1965 年，他就提出了按规律有计划调节货币流通的政策主张。20 世纪 80 年代初，他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建立“二元银行体制、多重信用形式”的主张，即区分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人民银行要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建议发展多元信用形式，推动多种金融机构发展。货币政策与金融调控是周骏教授学术研究的重点，他在其中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建议：现金应单独作为一个货币供应量层次；我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选择应是稳定币值和发展经济双重目标；货币政策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防止通货紧缩；货币供应量既要满足作为交易媒介的货币需求，又要满足作为资产的货币需求。周骏教授主张资源配置必须“两只手”配合，即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优化资源配置，而优化资源的配置，既要市场调节的“无形的手”，又要政府计划的“有形的手”，只有这样，才能有效率地利用资源，最大限度地增进人民福利。

勤奋治学与踏实做人

周骏教授在学习和工作上极为勤奋。我曾亲耳听他说，别人在看电视的时候，你在看书；人家在玩你不玩，人家不学习你学习，当然你的成果就会多一点；做学问就是靠下工夫，没有什么窍门。他几乎没有节假日，平时不看电影，不逛公园，而是将精力用在做学问和教书育人上，真所谓“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尽管已年过八旬，但他仍坚持学习，坚持研究，坚持给学生作专题讲座。我们既为他身体之健康硬朗感到由衷的高兴，又为他活到老、学到老、研究到老、工作到老的精神感到无比的敬佩。

“勤勤恳恳做事，踏踏实实做人”，是周骏教授的信仰，也是他的真实写照。他经常告诫我们，“一个人要做事，先要做人”；“人活着，就应为国家和社会做点有益的事情”。他认为：一个人要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不困难的，但总要有个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例如，对国家要忠心、对朋友要义气、对父母要孝顺、对子孙要慈爱、夫妻之间要讲情义等。他尊重他人，从不摆架子，经常称呼我为“清华同志”。他在参加我们班毕业 20 周年聚会时告诫我们“得意不要忘形，失意不要丧志”，让我们永远不能忘怀。

面表达内心的真实情感”。治学要做到名实、言行、表里一致。张先生治学的座右铭就是“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季羨林先生也曾说他对于张岱年先生的为人“心仪已久”，认为张先生具有多种优秀的品质，在“当今士林中，真堪为楷模”。大凡跟张岱年先生有过交往的人，都会有这样深切的体会：他平等待人，平易近人，有求必应；刚毅木讷，直道而行，反对“卖论求官”，曲学阿世；海人不倦，奖掖后学；厚重朴直，淡泊明志，生活俭朴。他的弟子刘笑敢先生说他具有“三诚”，即“为学真诚，为师热忱，为人坦诚”。

张岱年先生在其 70 年的学术历程中，不仅为中国学术界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而且为后世留下了丰硕的精神财富。他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哲学家和哲学史家，青年时代就和其兄长张中府先生一同接受马克思主义，此后一直没有中断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晚年曾说，“辩证唯物论是当代最伟大的哲学”，“唯物主义的真理是颠扑不破的”，“我对于唯物主义之为真理深信不疑”。他一生坚持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研究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并建构了新唯物论哲学体系，提出了综合创新文化观。李存山先生总结张先生一生的学术贡献，认为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理论和基本特点的探索，对中国传统哲学概念范畴的疏释，对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传统和辩证法思想的表彰，对中国传统道德伦理和价值理想的研究，对中国哲学史史料的梳理和方法论探索等，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传CHUAN DENG LU
灯录

“燕京学派”何以可能

——对齐钊商榷文章的再商榷

□胡炼刚

笔者于 2011 年 2 月 24 日在《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6 版上发表了《中国社会学史上的“燕京学派”》一文（以下简称“拙文”），简单介绍了“燕京学派”的形成、发展及其学术影响。齐钊于 2011 年 8 月 18 日在《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7 版上发表了《且莫轻言学派终结》一文（以下简称“齐文”），对拙文中的讨论前提及相关论述，提出了一些商榷意见，本文针对这些商榷意见作出回应。

齐文的商榷意见

齐文第一个商榷意见是，拙文在论述中并未指明“燕京学派”可以称为一个学派的要素和条件。关于这一点，拙文中只是引用了台湾学者孙中兴在 1987 年博士论文中的观点而已，确实未作过多交代。

齐文第二个商榷意见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本身具有社会学与人类学相结合的特点，而拙文对“燕京学派”的论述既未参照对象，也未社会学与人类学的整体视野，更未及学界所熟知的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南北两派的讨论，拙文所论述的内容不过是在重复前人已做的工作。齐文还对两岸学者关于中国人类学、北两派的讨论作了详尽介绍。

我们要回答“燕京学派”何以可称为一个学派，自然要以 1949 年以前中国社会学发展整体情况作为参照与讨论背景，至于中国人类学史或民族学史上经常提到的南、北两派问题，王建民在《中国民族学史》（上卷）中早已提到，台湾学者李亦园、唐美君、黄应贵等人是将南、北学术特色与学派直接等同，实际上是将中国民族学划分成南、北两大区域，认为每个区域具有不同的学术特色，由此出现南、北特色的论题。在笔者看来，这种对中国人类学或民族学区域上的南、北划分，至多只是反映了各自的学术倾向与分工，对讨论中国社会学的学派问题，意义并不大。

齐文第三个商榷意见是，拙文对“燕京学派”终结的论述有失草率，以杨庆堃移居美国后所出版的三部著作作为“燕京学派”结束的标志，令人感到仓促不当；同时，齐文以中国社会学与人类学重建后，费孝通仍在用社区方法与功能理论进行研究为例，来证明“燕京学派”并未终结。事实上，1949 年以后，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大陆中断了将近 30 年之久，而 1979 年恢复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在学术品格上与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学已大不相同，因此，我们断言民国时期的“燕京学派”已经逝去，是毫无疑问的。当然，我们也期待今天的中国社会学能产生自己的学派。

至于齐文所指出的“让已有的学术传统‘活’在当下”的问题，学界早已有学者呼吁“重新认识中国社会的思想传统”（参见《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 4 期），而笔者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很明确：“行胜于言”。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重点回应的是第一个商榷，即“燕京学派”何以可称为一个学派。

“燕京学派”何以能称为一个学派

我们要回答“燕京学派”何以可能，首先须明白区分学派的标准有哪些；其次须考察 1949 年以前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史，弄清当时产生了哪些学

术传统及其各自发展状况如何等问题。

孙中兴在其博士论文中认为，区分学者派别归属的标准至少包括“组织联系”和“认知关注”，即共享相同的组织背景，趋向于形成相同的认知兴趣。而这两者的结合，在学术共同体的成员中又趋向于蕴育出一种群体感和互惠性规则。同一派别的学者，在学科问题、研究方法和概念框架的选择上，趋向于产生相同的兴趣，其研究结果趋向于相互支持。此外，他们趋向于聚集在同一组织中，尤其是当存在一种师徒关系的纽带时，更是如此。同时，当领袖人物具有眼光与执行热情时，其认知关注一旦形成，将趋向于传递给下一代；在“代际传递”的过程中，组织联系和认知关注又趋向于相互加强。由此可知，当我们考察一个学派时，至少应从组织联系、认知关注和代际传递三方面着手。

杨堃在《中国近三十年来之出版界：社会学之部》（1943）一文中，将中国社会学之发展史划分为“萌芽时期”、“宣传时期”、“学派时期”和“建设时期”。他认为，中国社会学的学派时期，也可称为系统的介绍时期，出现于 1929 年。这一时期有四个主要学派：一是美国文化学派，以孙本文为代表；二是马克思主义学派，以李达和许德珩为代表；三是法国涂尔干社会学派，以崔载阳、胡鉴民、叶法华、杨堃等为代表；四是英国功能人类学派，以吴文藻、李安宅和费孝通为代表。在孙中兴看来，当时中国社会学界的这些学派，主要反映一些领军人物的认知兴趣与学术分工，而较少反映它们对全体中国社会学学者的一般影响。

至于中国社会的建设时期，杨堃认为大约始于 1933 年，而 1933—1937 年为介绍与建设并重时期，1937 年后几乎完全进入研究时期。同时，他从方法论的观点将中国社会学建设运动区分为六类：一是“社会调查”，以李景汉、陈达等为代表；二是“社区研究”，以吴文藻、赵承信、李安宅、费孝通、黄迪为代表；三是“民族学”，以凌纯声、杨堃、黄文山等为代表；四是“民俗学”，以杨堃等为代表；五是“社会史”，以陶希圣、吴景超为代表；六是“古史学”，以李玄伯、孙作云、杨堃等为代表。孙中兴认为，以上六类中，只有燕京大学社区研究的知识传统被其杰出的年轻一代继续下去；而其他派别并不为人所知地产生了杰出的学生来推进其事业。

显然，在谈到中国社会学的建设时期时，杨堃并未提到“系统学派”的孙本文，因为孙本文的多部著作出版于 1943 年后；杨堃也未提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建设运动”，因为 1937 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整个进程被打断，此后只有零星的工作；杨堃也没有再提及“马克思主义学派”，这可能是因为，1927 年后，国民政府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采取限制政策，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国统区处于“暗流”地位，并未对一般社会学者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并参照“燕京学派”的发展过程，可知，在组织联系上，“燕京学派”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发源地，抗战期间又以“燕京—云南社会学研究工作站”为基地，在其学术领袖吴文藻倡导下，以社区研究作为认知关注；从代际传递来看，早期中国社会学中只有燕大社区研究的知识传统被其杰出的年轻一代继续下去。因此，我们可以说 1949 年前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中，真正形成一个学派的只有“燕京学派”。

学林XUE LIN XIN ZHU
新著

《周辅成文集》出版



两卷本《周辅成文集》近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收录了周辅成先生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许多重要论著，其中，1949 年以前出版过的作品，在最近 60 余年内从未再版过。文集内容以伦理学为主，而涉猎范围很广。20 世纪 30—40 年代之间发表的文章，显示出该时期作者主要关注的是近代西方伦理思想。20 世纪 50 年代发表的文章，显示出该时期作者主要关注的是中国古代伦理思想。20 世纪 60—80 年代发表的文章，显示出该时期作者的主要关注对象又回到了近代西方伦理思想，同时对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也有了新的认识。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作者还写作了大量回忆过去师友学人的文章，也收在了该文集中。

（北清）

学林XUE LIN SAN Y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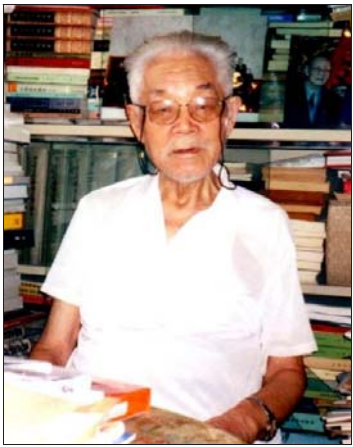
“德学双馨”的张岱年

□高昌昌

从 1988 年算起到 2004 年张岱年先生去世，作为晚辈后学，我和张先生的交往已有整整 16 年。我和张先生初识是 1988 年 4 月在洛阳召开的洛学与传统文化学术研讨会上。当时，我还是《中州学刊》的哲学编辑，参加有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参与的全国性会议，这对于一个刚刚走出大学校门、尚未真正步入学术殿堂的哲学编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学习和提高自己的机会。所以，我的目的很明确，一是学习，二是组稿。在大会开幕式上，我认真聆听了精神矍铄的张先生的主题报告，兴奋之情无以言表，又是做笔记又是录音。张先生虽略显口吃，但声音洪亮，简洁、清楚、明白的演讲颇具吸引力。会后，我反复听他的讲话录音，整理了他的发言稿，题目是《正确评价二程洛学》。我将文稿寄给张先生，经他亲自修改定稿，发表于当年的《中州学刊》第 4 期上。遗憾的是，张先生的讲话录音没有保存下来。

此后的十几年间，我与张岱年先生曾多次见面、通信，并曾专程到他家拜访，在交往中深切地体会到他对后辈学人的关心和鼓励。

2001 年 7 月，在第 12 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上，大会主席方克立先生派我照顾张先生。中午就餐前，张先生刚刚坐下来，南京大学哲学系一位教授就俯身请张先生为他题字。张先生用硬笔在一张白纸上很认真地写下那位老师提前写的一幅字。我看张先生很有兴致，顺便也请他为我写两句勉励的话，张先



■张岱年

生没有推辞，爽快地拿起笔，在会议手册空白页上（我没有提前准备纸张）写下了八个有力的大字：“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当时，我十分感动，深切体会到张先生平易近人、奖掖后进的长者之风。这八个大字既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神和以张先生为代表的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精神，也包含了张先生对中国青年一代知识分子的希望。

张岱年先生已将其最心仪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一中华民族的精神内化为自己的人格，并以身作则，用一生的时间实践了它。可以说，这两句话既是张先生为学为人的宗旨，也是他一生品格的集中体现。冯友兰先生曾对张岱年先生有这样的评价：“张先生治学之道为‘修辞立其诚’，立身之道为‘直道而行’。”张先生平生服膺的格言之一就是“修辞立其诚”。“诚”即“言论符合实际，一方面符合客观实际，一方